

党一贯坚决防止和反对本位主义

核心阅读

本位主义是一种顾小我舍大局、顾小益损大利的处世态度和心
理状态，毛泽东将其称为“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只
顾自己不顾别人，对党和国家事业极易造成损害，在党的历史上向
来受到批判和反对。

□ 祝 彦

本位主义“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 和离心作用”

根据历史文献检索发现，“本位”二字较早就存在，甚至在建党之前的某些文章中就有过使用。如恽代英早在1920年撰写的《论社会主义》一文中就发表了对“个人主义”和“以个人为本位”的看法。在建党之初的文献中，“本位”多是与资本、资金等并列构成经济名词，或是与劳动者、青年、阶级、产业机关、国家等并列表达集体主义思想。而作为一种现象，在建党初期“本位主义”并没有直接出现和使用，而较为普遍采用“个人主义”的说法。如陈独秀在与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时，曾措辞严厉地批判个人主义顽固派，指出：“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又如党的三大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等本位主义现象。

“本位主义”一词正式出现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则比较晚。1929年6月，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罗列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14个错误思想和习惯，其中就敏锐地指出了“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这一现实问题。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将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毛泽东对本位主义的剖析可谓一针见血，这种“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屡见不鲜。

例如长征途中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其根源是其从本位主义出发，形成的野心膨胀。1937年底，王明回国公然提出与中央对立的右倾错误路线，以及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将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也是本位主义作祟。林彪同样犯有本位主义错误。早在红军东征作战期间，红十五军团伤亡较大，毛泽东给红一军团发电要求拨兵补充给红十五军团，时任军团长的林彪却犯了本位主义的毛病，不服从前委意

见，不肯补充支援红十五军团。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5月13日至15日红一方面军于陕北延川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会上，毛泽东点名严厉批评道：“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你林彪个人的队伍！”

延安整风运动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主要任务中，也包含对本位主义的整顿。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指出：“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了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

“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 必须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党内滋长的派别思想、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习气，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惕。首先，党中央着重阐明了本位主义思想的实质及其危害，指出：“党内有些本位主义的思想，常常不自觉地给党外人士的权位思想作了支柱，妨害内部工作上应有的统一领导。”“片面强调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破坏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其次，指出本位主义是滋长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的温床。对此，毛泽东提出明确要求：“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再次，针对党内发生的问题，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出了包括反对本位主义在内的“六条规定”，对于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对增强党的团结重要性的认识，防止骄傲情绪和夸大个人作用的倾向在党内滋生蔓延起到了重大作用。另外，党中央通过各种方式（当时主要是开展运动）反对本位主义。如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60年代又开展了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撤出和清除了一批党内无组织、无纪律的“害群之马”“异己分子”。此外，党中央还尤为重视在经济建设领域强调大局意识。如在编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党中央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必须批判。”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在

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工作汇报时专门讲到本位主义的问题，指出：“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持反对本位主义。邓小平批评指出：“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加强全党的团结，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

“无论作什么决定、办什么事 情都必须符合大局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建设，针对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的本位主义问题，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多措并举有效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思想的泛滥。第一，针对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缺乏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决不允许”重要论断，即“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第二，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本位主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解决政治性强、破坏力大的问题，诸如在重大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对党不忠诚老实、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做‘两面人’问题，选人用人上任人唯亲、任人唯利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问题，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野心膨胀问题，等等。”第三，针对党内存在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同时指出：“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无论担任什么职务、拥有多大权力都要执行集体作出的决策，无论作什么决定、办什么事情都必须符合大局需要”“要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处理好全局和局部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本位主义的滋长蔓延，从根本上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的薄弱。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要求做到“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对包括本位主义在内的错误思想保持高度的警惕。



党的十九大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作出了新部署，并进一步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在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全体党员的党性必须坚强。全体党员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既要注重内容的针对性时效性，又要注重方法的科学性系统性。

运用主要平台。党性修养和锻炼的主要平台是党内政治生活。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增强党性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党性锻炼的熔炉。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高低，事关党员的作风状况，事关党内的政治生态，事关党员的党性强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性锻炼的平台建设。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与时俱进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它和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起，向全党确定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系统性要求。通过严肃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营造提高党性修养的良好氛围，确保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性修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落实这一要求，离不开组织生活制度的坚强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要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了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的目标，要求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努力加强政治、思想、道德、纪律和能力等方面的修养，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体党员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反复锻炼，才能使党性逐步坚强。

加强改进作风。党性是党风的内在本质，党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党性修养是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运用党性原则规范自己行为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过程。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外在表现就是加强改进作风。党员改进作风的过程就是加强党性修养。实践证明，作风不会随着党员领导干部职务升迁和年龄增长而自然向好，需要主观努力和外在监督。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不断地接受来自党内外外的作风监督，努力持续改进作风。这就意味着党性在不断增强。但党性修养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改进作风上。作风问题最容易反弹，原因就在于仅仅停留在作风的一时改进上，而作风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党性出了问题。因此，要在改进作风的基础上，乘势而上，继续解决党员的党性问题，包括党性原则是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削弱党性的外在因素是否清除等等。

发挥引领作用。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是对全党8900多万名党员的普遍和持久的要求。党的自身硬起来当然需要全党的共同努力，但关键要靠党的各级干部的引领和示范。加强党性修养，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这既是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执掌重要权力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发挥示范作用的特殊职责所要求的。习近平总书记对“一把手”和高级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加强对各级“一把手”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促使他们带头遵守党章党规，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党性修养。高级干部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牢固树立党的观念，始终做到党性坚强、党纪严明，以此带动引领普通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明确衡量尺度。**党员的党性有着严格的

新时代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方法

□ 孙玉华 李朝阳

衡量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衡量党员党性强弱有两个尺度：一是根本尺度，二是重要尺度。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度是公、私二字。作为拥有公权力的党的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公私观，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这是共产党人党性强的重要体现。只有确立正确的公私观，才能形成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真正将新时代党的“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落到实处。衡量党性强弱的重要尺度，就是能否正确对待、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只要坚持正确的公私观，就应不怕监督，就不要拒绝监督，相反应该欢迎监督，让监督成为常态。总之，要自觉运用衡量党性强弱和水平的两个尺度，经常来检测党员自身的党性修养水平，确保党性修养不断增强。

党建视角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 我党廉政建设经验

□ 何增科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我 党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在于综 合发挥了榜样、信仰、制度和 监督四种力量的作用，是中国 共产党人廉政建设的早期探 索。它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优秀基因，属于一种复合型的 反腐败方略。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11月—1929年1月）和中央苏区时期（1929年1月—1934年10月）是我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和局部执政的时期。有了政权哪怕是局部的政权，就有了腐败的可能性。我党因此早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就积极加强廉政建设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广为传唱的歌曲“苏区干部好作风”反映了当时苏区干部良好的工作作风。歌曲中唱道：“苏区干部是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苏区干部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歌曲的创作来自于生活原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响应中央号召自带伙食干革命。他妻子怕他饿着，给

他挑粮食，并开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他回答说：“革命成功，吃穿不穷。”两人的俏皮话在苏区传为佳话。在突围时，他背着省委交给他保管的大量银元，自己却靠沿街乞讨维持生计，最终后于把珍藏的巨款交给组织。他被人称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在随后的根据地政权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种良好作风成为我党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根据地政权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悠悠万事唯人民利益为大，一个局部执政的廉洁的政党、一支廉洁的军队、一个廉洁的局部地域的政权，在与腐败的执政党、腐败的军队和腐败政权的较量中，由于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和拥护，力量倍增，最终赢得了胜利。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它们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我党廉政建设的成功。

毛泽东、朱德等根据地领导人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同甘共苦，为根据地党政军民作出了表率。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敌人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毛泽东号召全体军民厉行节约，并向全军宣布了一个关于用

油灯的规定，团、营、连部晚上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他自己本来可点三根灯芯，但却一直用一根灯芯办公、看书、写文章，还常常忙到深夜。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下，毛泽东在井冈山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朱德上井冈山时已经40多岁，红军在山路挑粮时他也和大家一起挑粮，一些干部战士怕他年岁大吃不消，藏起了他的扁担。他重新做了一根扁担并刻上自己的名字。朱德和官兵一起挑粮，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毛泽东、朱德等根据地领导人的示范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根据地干部的工作作风。

有信仰有气节的共产党干部做到了廉洁自律。唯有有信仰有气节者可以自律。真正的共产党人笃信共产主义，坚持为劳苦大众而奋斗，这样在个人利益和组织要求发生矛盾时、在家和国不能两全时以及公私利益冲突时他们能够作出合乎道义的选择，舍小家顾大家。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

……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他的话代表了许多革命者的心迹。

依靠严明的纪律和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大多数条款都是有关廉洁纪律和群众纪律的内容，正是严明的军纪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损害群众利益，处处维护群众利益，群众才能对这样的军队“拥护又喜欢”。中央苏区还制定了专门的法令来同根据地的贪污浪费行为作斗争。1932年12月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明文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从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先后查处了中共胜利县县委书记钟圣琼和该县苏维埃主席钟铁青贪污腐败案、“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案等一系列苏区干部贪污案，分别判处有关人员以死刑，在中央苏区开了“杀戒”，引起极大震动。在查处大案要案的同时，对其他贪污浪费行为也予以坚决查处。

厉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加强民主建

设，发挥好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在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框架下，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一方面加强党对军队和政权的领导，另一方面努力加强民主建设发挥好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毛泽东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通过民主生活会努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些不良思想倾向在批评监督中被及时发现和纠正。政权建设中反对简单委派军队干部担任政府领导，强调通过工农兵各界代表推举或民主选举产生政权。在政府内部建立代表会和委员会会议的运作机制。军队中设立士兵委员会参与军队管理，维护士兵权益，官兵平等，激励士气。同时，努力健全各级监督机制。中央设立党务委员会，省县设立监察委员会，以便与各种不正确倾向和腐败现象作斗争。政府内部设立工农检查部，实行上级巡视或检查，建立中央审计委员会实行审计监督。在舆论监督方面，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设立“突击队”专栏，军队《红星报》开辟“铁锤”专栏，《青年实话》开办“轻骑队”栏目，《苏区工人》设立“反对贪污腐败”专栏，以揭露和谴责各种贪污浪费现象。在群众监督方面，工农检查部设立控告局接受群众检举揭发控告。在民主监督方面，对不称职的代表，选民们有权将他们撤换、召回。

苏区廉政建设多措并举收到了明显的成效。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中央各部5—8月份的经费开支后发布的审计报告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史海拾贝